



## 返?文学与?争?? : 以水上勉的《沈?之月》?中心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The Literature of the "Returnees" and War Memory : The Moon of Shenyang (瀋陽の月) by MIZUKAMI-TSUTOMU
著者	? 光?, 王 嘉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volume	13
page range	463-476
year	2020-03-31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10112/00020032">http://hdl.handle.net/10112/00020032</a>

# 返迁文学与战争记忆

——以水上勉的《沈阳之月》为中心

吴 光 辉·王 嘉

The Literature of the “Returnees” and War Memory:  
*The Moon of Shenyang* (瀋陽の月) by MIZUKAMI-TSUTOMU

WU Guanghui, WANG Jia

The famous Japanese writer, MIZUKAMI-TSUTOMU, who is one of the Japanese civilian settlers, once stayed in “Manchuria” for about three months and then returned to his homeland due to illness. However, such a short “Manchurian experience” made MIZUKAMI-TSUTOMU bear a sense of guilt and regret all his life. Until 1986, this deliberately forgotten “life vacancy” was completely publicized in the form of a novel *The Moon of Shenyang*. This article attempted to adopt the two concept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returnees’” and “cultural memory” to deeply explore the themes of “memory”, “female” and “redemption”, 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novel. The present article also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unique narrative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novel, such as “time intertwining” and “metaphors”, to try to approach the author’s inner world.

Key Words: MIZUKAMI-TSUTOMU, war memory, Manchurian experience, returnees

キーワード：水上勉、戦争記憶、満州体験、引揚者

## 引言

何谓“返迁文学”？正如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家、评论家川村湊所指出的，即便到了现在，移住和返迁的海外体验仍是日本国民最基本的原体验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自大陆而返迁回来的人撰写了大量的体验记录或、体验小说，也就是‘返迁文学’。”<sup>1)</sup>日本人的海外移民肇始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的日本向南美、菲律宾进行了海外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向中国东北即“满洲”移

---

1) 川村湊，《異郷の昭和文学》，岩波書店，1990年，第60页。

民。到了战后，移民到菲律宾、中国的日本人几乎全部“返迁”回日本本土<sup>2)</sup>。因此，审视战后日本文学史，记录自战争结束到返迁回国的痛苦体验的文学作品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20世纪日本文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故而川村湊将之命名为“返迁体验文学”。与这样的依照主题、题材或者背景来进行界定不同，中国研究者柴红梅则以文学的创作者为主要依据，指出日本的“返迁体验文学”既包括成人的体验记、回忆录，也包括“二代移住民”根据自己海外“殖民地”的生活和返迁体验而创作的文学作品<sup>3)</sup>。换言之，柴红梅的研究将“返迁体验”拓展为日本人的“返迁记忆”，扩展了“返迁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

基于这样的不同诠释，本论借助“返迁文学”这一概念，将日本小说家水上勉（1919-2004）界定为一名“返迁文学者”，由此而尝试对其代表作之一的《沈阳之月》（1986）展开探讨。不过，必须指出一点，即水上勉作为开拓团的一员自日本到中国大陆，曾在“满洲”滞留三个月左右，而后便因病匆匆归国。尽管时光短暂、体验极少，但就是这一段“满洲记忆”却让水上背负了一辈子的愧疚与悔恨。就此而言，本论将之称为“返迁文学者”亦不为过。事实上，在水上勉的文学创作之中，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确实不少。依照中国学者孙旸的研究，这一题材可以分为以《按铃人》（1971）《小孩》（1979）《沈阳之月》（1986）《清富记》（1993）《慧能》（1995）等为代表的一批小说，以《蟋蟀壶》（1967）《北京的柿子》（1979）《大连蓬坂町》（1979）《沈阳的天空》（1981）《在沈阳》（1987）为代表的系列纪行文，以《再访的喜悦》（1975）《井上先生的中国》（1991）《缅怀团伊玖磨》（2001）为代表的系列随笔<sup>4)</sup>，可谓是留下了不少中国记忆，故而也成为日本“返迁文学”这一类别作家群的代表之一。

## 一 《沈阳之月》的前期研究

在概述水上勉的前期研究之前，在此简要介绍一下水上勉的人生体验与文学创作。水上勉的整个生涯，可谓是经历了现代日本的战争与和平、动荡与安定的一段波澜壮阔的时期。水上勉出生于福井县若狭町，自幼家境贫困，九岁被迫进入寺院，数年之后出走，而后读完中学，并肄业于立命馆大学。在此期间，水上从事过送报、卖药、编辑等三十多种职业，遍历了人生的冷暖辛酸。水上勉与中国之间的邂逅源起于1938年。根据祖田浩一《水上勉年谱》记载，1938年8月，水上勉作为京都府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招募系下的一员，乘坐“哈尔滨丸”来到中国，在奉天（如今的沈阳）国际运输公司担任见习，监督中国与朝鲜的苦力劳动。同年11月，水上罹患肺结核而不得不回到日本。尽管在中国只是停留了三个月左右，却成为其不可磨灭的记忆、文学创作的契机<sup>5)</sup>。

返回日本疗养期间，水上勉阅读了《谷崎润一郎集》《芥川龙之介集》、井伏鱒二（1898-1993）的不少作品，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48年，水上发表处女作《平底锅之歌》，正式登上日本文坛。1961年，水上创作了小说《雁寺》，获得日本文学大奖之一的直木奖，奠定了自身作为日本代表性作家的重要地位。1975年，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的一员，水上再度访问中国，燃起了创作中国题材的热情。2004年9月，

2) Harumi Befu, 《日系アメリカ人の歩みと現在》，人文書院，2002年，第11页。

3) 刘楚婷，柴红梅，《忘却的“人生空白”——水上勉的沈阳体验与文学创作》，《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年第2期，第72-78页。

4) 孙旸，《中国禅宗思想对水上勉及其文学的影响》，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22页。

5) 祖田浩一，《水上勉年谱》，《水上勉の世界》，新評社，1978年第11卷，第202-210页。

水上勉因肺炎去世。在长达56年的创作生涯中，水上发表了约200多篇小说、200多篇纪行文、100多篇随笔。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水上创作了大量的以中国为舞台的小说、随笔、游记等，成为不少日本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对象。

围绕水上勉的前期研究，我们可以提到斋藤节朗主编的《水上勉の世界：全特集》（新评社，1978年第11卷）、西口彻主编的《水上勉：癒しと鎮魂の文学》（河出书房新社，2000），具有了理论指导与文本剖析的示范意义。尤其是中国学者孙旻著述的《水上勉的中国体验——创作作品的源泉》（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与《中国禅宗思想对水上勉及其文学的影响》（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皆以“水上勉的中国相关作品”为研究对象，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参考。不过，围绕《沈阳之月》这部小说的评价，迄今为止的研究者可谓是呈现为三大话语结构。具体而言，

首先，就是作为“历史”的政治话语。孙旻的研究论文《水上勉「瀋陽の半月」と「瀋陽の月」——加筆改稿が意味するもの——》采用文本对比的方法，针对《沈阳的半月》与《沈阳之月》两个版本展开了细致的考察，在考察多处“加笔改稿”的基础上，孙旻指出原稿《沈阳的半月》只是就过去的回忆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而《沈阳之月》的“加笔”内容大多是关于“残留孤儿”“苦力”“娼妓”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因而更为接近“战争”时期的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sup>6)</sup>。刘楚婷、柴红梅的研究论文《忘却的“人生空白”——水上勉的沈阳体验与文学创作》站在都市空间的视角，以水上勉文学之中的沈阳体验为中心展开论述，指出水上勉带着一种赎罪感和祭拜的心情去揭开曾被自己刻意遗忘的“沈阳”这一都市空间的“空白部分”，从而进行了深刻的自省和反思<sup>7)</sup>。

其次，就是作为“对象”的形象话语。孙旻在《水上勉「瀋陽の月」の語るもの——娼婦回想の意味と叙法》一文之中整理提示出时空交错的多层构造下的三位妓女形象的描写，展现了水上勉文学之中的“女性主义”意识<sup>8)</sup>。郭丹在《水上勉作品中的沈阳人形象》一文中则是站在文学比较的视角，结合水上勉的《沈阳之月》、夏目漱石（1867-1916）等作家针对中国“苦力”形象的描写，揭示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人眼中的沈阳人的形象，再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不仅如此，该论文还分析了水上勉的小说《小孩》之中的中国少年形象，进一步批判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残酷与罪恶<sup>9)</sup>。

第三，则是作为“本体”的文学话语。在《水上勉的创作道路》一文之中，柯森耀将水上勉的文学创作按照时间线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私小说时期”、“推理小说时期”和“回归纯文学时期”，指出水上的创作或是接续日本传统，或是展现推理小说的新风格，或是形成自我的“纯文学”，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sup>10)</sup>。孙洪杰则在《试论水上勉的文学创作风格》一文中亦对水上勉的创作风格进行了表述：“这些作品虽然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你在认为他是随笔的同时，也能使你感到又是小说，水上勉文学特色就是隐藏

6) 孫旻，《水上勉「瀋陽の半月」と「瀋陽の月」——加筆改稿が意味するもの——》，《現代社会文化研究》，2010年3月，第1-19页。

7) 刘楚婷，柴红梅，《忘却的“人生空白”——水上勉的沈阳体验与文学创作》，《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年第2期，第72-78页。

8) 孫旻，《水上勉「瀋陽の月」の語るもの——娼婦回想の意味と叙法》，《表現文化研究》，2010年第2号，第1-31页。

9) 郭丹，《水上勉作品中的沈阳人形象》，《现代语文》，2014年第8期，第55-56页。

10) 柯森耀，《水上勉的创作道路》，《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第50-55页。

在这种感觉之中的。讨论水上勉的小说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并没有意义。”<sup>11)</sup> 换言之，水上勉的文学创作超越了小说与随笔、真实与虚构这样的内涵，超越了迄今为止的文学范畴，具有独特的风格。

作为一名“返迁文学者”，水上勉的后期人生与文学创作被打上了极为显著的“大陆气息”。以1975年战后初次访华为开端，水上勉多次造访中国，并游历了曾经体验过的大连、沈阳等东北城市。《沈阳之月》就是以此为契机而创作的一部作品，它连接了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代、中国与日本，但是却几乎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审视迄今为止的前期研究，应该说这一批研究提示了多样化的主题与方法，展现出水上勉独特而超逸的文学创作风格，提示了水上勉作为一名文学者“难以定论”的性格。不过在把握水上勉的“文学身份”之际，却基本未将其作为“返迁文学者”来加以思考。本文将基于这样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这样一批成果基础之上，站在“返迁文学者”的立场围绕文学主题与叙事策略来展开论述。

## 二 《沈阳之月》的文学主题

承前所述，《沈阳之月》这部小说是以刊载于《新潮》昭和六十一（1986）年新年号的原稿《沈阳的半月》为基础，而后加笔、改稿而成。与《沈阳的半月》围绕“满洲记忆”客观叙述的基调不同，《沈阳之月》加笔改稿的内容更多地描写了“妓女”“苦力”“遗留孤儿”的相关内容，因此也留下了不少可持续研究的主题。不仅如此，围绕这部小说，我们也需要就时代政治、人物形象，尤其是战争与殖民的问题来展开研究，以弥补迄今为止的研究空白。

基于这样的文本内涵与前期研究，本论尝试树立起记忆、女性、赎罪这样的文学主题，并进一步深入到《沈阳之月》的文本之中展开剖析，以期待更进一步地接近水上勉这一作家的内心世界。

### 1 记忆

作为“记忆”，或许我们会联想到如今流行的“记忆文学”（Memory literature）。依照余秋雨的提示，“它不是小说，因为里面的记忆都是真实的。它不是回忆录，因为里面的记忆不全是自己的，所以又体现出了文学性。”（记忆文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记忆文学/2464198?fr=aladdin>）换言之，所谓“记忆文学”，既是真实，是过去的记忆呈现；又不是自我的真实体现，带有了文学的创造性。一言蔽之，“记忆文学”兼顾了记忆与文学的二重属性，是介于记忆与文学之间的“跨领域”类别。

在此，我们会联想到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 1938-）针对“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所谓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sup>12)</sup> 换言之，文化记忆首先是一个集体记忆，而后成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记忆。不过，文化记忆与一般的集体记忆不同，它是一种超越了国界与语言，并借助社会提供的形式和媒体而形成、传播和延续的一种记忆。这样一来，文化记忆既融入到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历史中，通过集体记忆的方式来加以呈现与表述，也会超越民族或者国家的范畴，呈现为与“返迁文学”相匹配、相呼应的深刻内涵。不过在此，我们也禁不住产生一个疑问，

11) 孙洪杰，《试论水上勉的文学创作风格》，《外国问题研究》，1996年第2期，第51-55页。

12) 姚继中、聂宁、杨清，《日本文化记忆场》，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页。

即经历了“私小说”“推理小说”“纯文学”的不断演绎的水上勉，其通过“个人记忆”所创作出来的《沈阳之月》这部小说是否也带有“文化记忆”的内涵？

回到《沈阳之月》这部小说，所谓“记忆”可以说呈现为双重的结构，一个是四十八年前的过去，即作为“少年”的我；一个是四十八年之后的现在，即作为“老年”的我。小说在一开始就描述了一种“时代之感”，把读者的“思想”带入到一个漫长的记忆隧道之中。

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经历，如果能忘怀是再好不过的了。很认真翻阅过往，是这样，不是那样，好像倒翻年历，也没什么意思，然而只有对于伪满洲国的经历，近来我尤其怀念，常常想起。<sup>13)</sup>

审视这样一段话，我们至少可以提炼出作为“记忆”的多重性意象。记忆是过去，会让人遗忘；记忆埋在心底，即便是想忘怀也忘不了。记忆实质上什么也不是，更没有什么意义；记忆尤其令人怀念，时常想起，实质上与人的一生联系在一起，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开始为死而做准备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特别执拗于过去的往事，我重新面对了连跟妻子和孩子都没怎么讲的，只有自己知晓的那个时代，被忘却的，有意识地以及被忘却的“满洲”时代的空白部分，现在我要开始加以明确。<sup>14)</sup>

在四十八年之后，水上勉重回中国东北，依稀追寻“满洲记忆”，这也就是贯穿《沈阳之月》的最为重要的线索。不过，与所谓的集体记忆不同，对于水上勉而言，这些“记忆”并不只是单纯地代表自身的一段过去，它如一曲婉转的悲歌，道出了水上勉懵懂的青春与破碎的热望，交织着对故人的思念和感伤，更承载了其久久不愿提及与面对的痛苦与悔恨。

在此，我们可以提炼出“记忆”的第二个内涵，也就是作为“满洲”时代的空白。所谓“满洲”时代，也就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这一段时期。就在这一时代，水上勉将作为个人的历史与作为日本人的历史串联在一起，从而将民族与国家这样的范畴带入到个人的历史之中，个人的记忆之中。因此，《沈阳之月》所阐述的“记忆”，不只是作为个人体验的文学表述，同时也是作为民族或者国家的一段“空白”的填补。简言之，所谓“记忆”，不仅是从未消散的过去，同时也作为纯粹的内在而始终留在心灵深处；不仅是作为个人的体验而存在，同时也是作为民族或者国家的一段记忆。

## 2 女性

围绕着《沈阳之月》的“女性”主题，事实上不少研究者皆涉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水上勉「瀋陽の月」の語るもの——娼婦回想の意味と叙法》一文之中，研究者孙旻针对时空交错的多层构造下的三位妓女形象的描写进行整理，确立了她们各自不同的、即亲切、冷漠、善良的性格与姿态，亦藉此反观再

13)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4页。

14)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5页。

现了主人公经历“奔赴满洲的理想”“现实的冷漠”“人间的真情”的心灵感受的问题<sup>15)</sup>。

不过，接续之前的“记忆”主题，我们可以认识到“女性”实质上绝不是单纯的独立的存在，而是与作为“男性”的“我”始终串联在一起。不仅如此，女性也不是与这样的“我”彼此“对立”的存在，而是构筑起一种带有成长小说内涵的“互动”性的存在。

在《沈阳之月》的第三章，作者描写的第一位女性是一位来自朝鲜的妓女。

二十一岁。年龄可能也是骗人的吧。感觉比我大两三年的样子。基本不会日语，只是试着把单词排列起来就足够让我们彼此领会。瓜子脸、肤色白皙、基本没有眉毛、眼睛细长。说起来像是很呆板，其实没有那么呆板，高挺的鼻梁和不太明显的单眼皮都让我觉得天真烂漫、纯真无邪。<sup>16)</sup>

围绕自身与朝鲜妓女之间的关系，“我”在与翻译冷连全的对话中提到自己曾在大连停留五晚，而三晚皆留宿于朝鲜妓女处，因此“我”与她带有一种“相思”的关系。但令人倍感诧异的是，我却“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记不起来”。究竟是什么令主人公毕生难忘，但是却记不起对方的名字？或许我们可以联想到主人公的“成长”的问题。也正是由于主人公第一次在“异域”接触到女性，触发了一种“异国情调”的感觉，从而产生了“相思”的情怀。

紧接着，作者在第四章描写了第二位女性，是一位来自日本九州的妓女。

那个妓女看我时带有一种对年少者的轻蔑、警戒和好奇心。面部很柔软、身体却不可思议地多骨，近看的话，会意外地感觉到肉很结实。说是三十一岁，说实话，相信是真的，因为我是年少者，我可以从她那厚厚的嘴唇周围察觉到她特意隔开一点距离的倦怠感。<sup>17)</sup>

日本妓女同样也没有出现真名，但是较之朝鲜妓女的天真烂漫，在主人公的眼中，二者的态度可谓是与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位日本妓女偏于市侩傲慢，令“我”感到极为不舒服。水上在小说中写道：“境遇相似又同样贫穷，在这样的境遇下，比起亲切感，让人感到更多的是一种憎恨似的复杂情感。”<sup>18)</sup> 身在异国他乡，给予自身温暖的竟是外邦女子，而日本同胞却对自己轻蔑而警惕，这令本就抱有“自卑感”的“我”顿感悲凉。若说“我”是无意中忘记了待人温柔的朝鲜妓女的名字，那么对于这位日本妓女的真名，恐怕“我”是有意地选择了忘却，不愿再提起<sup>19)</sup>。

与前两位无名的妓女不同，“我”却清晰地记住了第三位妓女的名字，是一位名为浦野初枝的日本女

15) 孫陽，《水上勉「瀋陽の月」の語るもの——娼婦回想の意味と叙法》，《表現文化研究》，2010年第2号，第1-31页。

16)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20页。

17)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28页。

18)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28页。

19) 事实上，小说之中出现了“さと子”的标记，也许就是这一妓女的名字。不过，依照孙阳的最新研究，水上勉创造的这一人物并非是主人公触景生情而提起，或许她只是水上勉的一个虚构而已，其目的只是为了提示出满洲“悲剧”的实景。具体参考孙阳，《水上勉「瀋陽の月」の語るもの——娼婦回想の意味と叙法》，《表現文化研究》，2010年第2号，第1-31页。

子。关于这位妓女的特别之处，“我”这样回忆道：

老实说，来到满洲，能如此放松身心交谈的，无论男女，除了这个妓女，没有别人了。<sup>20)</sup>

当“我”在“满洲”受到病痛的困扰，是浦野的书信令“我”倍感关怀；“我”并没有过多地回忆这位浦野小姐的面貌，却转而想起了与其妓女身份不相称的大量的家具，仿佛通过家具可以想象到浦野每天认真使用它们的样子；年老的“我”经历了一场中国式婚礼，新娘手中的脸盆令“我”再一次回想起浦野和她的家具；在“满洲”与日本同胞相处的时候，“我”抱有极为强烈的“劣等意识”，是浦野和她的家具使“我”在异国找到了“家”的感觉。

正是在这样的记忆之中，四十八年之后重回浦野住处的“我”，忘情地呼喊道：

“浦野小姐，如今您在内地还健在吗？或许战争失败后，无处可归就一直留在沈阳柳町直到去世。……不管怎样，初枝小姐，我那之后一直活到现在，相隔四十八年，现在偶然机会重访了这里。……”“浦野小姐……如果您已经身在冥界，希望您能够想起北市场货物站的担任装卸马和猪的苦力监督的十九岁的少年，他今天来了……今年是六十七岁了……”<sup>21)</sup>

显而易见，朝鲜妓女与日本妓女虽然给年少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从始至终没有走进过我的内心。反之，“我”对于浦野的情感，可以说是一直支撑着“我”勇敢面对和始终追寻“满洲记忆”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此，我们可以勾勒出三位女性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形象，乃至在主人公的成长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朝鲜妓女可以说是“我”初到“满洲”时美好的愿景，日本妓女代表了悲凉的现实，而主人公在异乡经历了身心的折磨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就是如浦野初枝般的心灵的避风港。一言蔽之，“女性”在此不是作为对立的存在而呈现出来，恰恰相反，他们是作为了主人公面对新世界的“憧憬”、作为主人公成长的“催化剂”、作为慰藉主人公心灵的“良药”而得以树立起来的。

### 3 赎罪

不破哲三在论述水上勉这部作品之际，曾将之作为水上的个人回忆录来加以理解，提到“《沈阳之月》是水上先生经历半个世纪后寻访现场，一边行走一边回想沈阳时代的生活的独特的长篇纪行，也许是能更深刻地表达自己内心反思的作品。”<sup>22)</sup>不过，正如木村光一所指出的，日本战后大多数带有战争记忆的文学皆是以“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为对象，构筑起日本人作为战争的“受害者”的形象<sup>23)</sup>。但是，《沈阳之月》却向读者提示，不少在满洲的日本人，哪怕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也是作为“加害者”的存在

20)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140页。

21)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158-159页。

22) 水上勉，《日本の戦争》，新日本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23) 水上勉、木村光一，《瀋陽1938——生きることの現場》，《世界》第613期，1995年，第121-122页。



而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保持了“协力”的态度。

小说之中，水上勉采取自传方式提示了主人公作为“加害者”的行动。首先，水上勉在这部小说的第一章，就对自己在“满洲”的职业展开阐述。“我”为了筹集学费，课余期间在京都府从事向“满洲”输送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的工作。辍学之后无处可依，故而自招募人员的一方转到被招募的一方，被派遣到中国沈阳，在北市场“满洲国际运输公司”担任一名“苦力监督见习”。

在小说之中，水上勉对于苦力的悲惨与辛酸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到了九月，早上和晚上都已经很冷了，苦力们干活仍裸露着粗糙的皮肤，真是叫人吃惊。形容得拙劣点，他们和坐在当时还是清水寺的五条坡和三条坡的地上乞讨的无业游民没什么两样。穿着皱巴巴的薄木棉裤子，上面缝着补丁，没有一个人系腰带，都用绳子系着。上半身几乎是裸着的，能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就算好的了，没有一个人好好地扣着扣子。胸脯上方的肋骨明显地突出，即使罩着稍微厚点的缝制的棉衣，都是手缝的，不像现在的带拉链的夹克。此外，用拼布做成的衬衣像抹布一样破破烂烂的，从中连肚脐都能看见。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些男人毛发都不深，现在回忆起来，不禁让人想起伴随着悲凉起着鸡皮疙瘩的胸脯。被晒黑的脸长满邈邈的胡子，干巴巴的脖子，像一周都没有洗过澡，粗糙的手掌，裂开和孩子的指甲一般大的口子，没穿鞋子光着脚，有那么一两个人穿着破烂的布鞋。<sup>24)</sup>

其次，小说之中多处描写了“我”的日本同事对待中国苦力的粗暴。不言而喻，主人公在此作为一个“旁观者”，同时也是“见证者”而存在。

竹刀的另一个用途就是用来鞭打这些干活的苦力。朝着手腕后背等这些露在外面的皮肤，使劲地鞭打，那力量，几乎可以立即将皮肤打肿。我听到过很多次这些苦力的哭喊声。一位像我父亲年纪一般大的40多岁的男子，无助地喊着“原谅我吧”，我看后觉得非常难过。<sup>25)</sup>

在此，水上勉不自觉地加上了“像我父亲年纪一般大的”这样的表述，并提示了“非常难过”。就此而言，水上勉的立场应该说就在一个不自觉地状态下开始自“监督者”的立场转向“苦力”的立场。之所以“非常难过”，也就是产生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由此而间接地衬托出一种“赎罪”的意识。对此，水上勉曾在与木村光一的对谈中提到：

我曾经是站在加害者一方的。虽然去沈阳的时候是“满洲”移民初期，然而“义勇军”和“农民开拓团”是在关东军侵略后才进入“满洲”的。（中略）用鞭子抽打地面就能让九到十人的苦力干起活来，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经历了这种体验之后，我就有了加害者的意识。<sup>26)</sup>

24)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88页。

25)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100页。

26) 水上勉、木村光一，《瀋陽1938——生きることの現場》，《世界》第613期，1995年，第121-122页。

在此，水上勉澄清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就是战后被迫离开“满洲国”的日本移民绝不是无辜的存在，其本质就是一群外来的“侵略者”。不仅如此，在这样的“侵略者”的身份之上，水上勉还提到了监督中国苦力干活，奴役驱使中国人的一种“加害者”的身份。——尽管水上是作为“义勇军”或者“开拓团”到了沈阳，并不是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士兵们一道。——不言而喻，这样的“加害者”的意识并不等同于所谓的“赎罪”意识，但是将之写出来，将这样的记忆展现在世人眼前，无疑带有了一种“赎罪”意识。在此，水上勉超越了迄今为止的日本人作为“受害者”的战争书写范式，提出了被掩盖起来的战争期间的“真实”。区别于迄今为止的“战争”研究，本文之所以没有将这部小说的主题限定在“战争”，而是选择以“赎罪”来界定之，实则是鉴于这一主题更为直接，更为具体，也与水上勉的创作目的更为契合之缘故。

### 三 《沈阳之月》的叙事策略

《沈阳之月》这部小说在出版之际，新潮社的《解说》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人生当中，总存在着超越虚构的事实吧。但是，《沈阳之月》或许不是虚构的剧，是作者静心沉思之作，正因如此直抵内心深处。‘伪满洲时代空白’之谜，是作家自我探索，还是镇魂之作，抑或是谢罪之举吧。”<sup>27)</sup>

就此而言，《沈阳之月》的小说创作带有了超越现实，回归内心深处的创作内涵，也带有了自我探索、拯救心灵的积极内涵。不言而喻，这样的基本内涵也体现在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之中。

#### 1 时空交错

所谓“时空交错”，是指突破了按客观时间顺序反映生活的局限，通过多层次、多变化的时空组织，表现人物隐秘复杂的内心生活。在《沈阳之月》这部小说之中，水上勉应该说一方面围绕小说的结构来加以阐述；一方面围绕小说的故事情节来加以编辑。

首先，我们可以提到“时间错位”。审视这部小说的结构，水上勉可谓是采取了时间交错编织的方式来推动故事不断延展。在第1、2章之中，水上进行了现实的描述，而后回到过去；到了第3-4章，则立足过去，就自身与朝鲜妓女、日本妓女之间的交往进行回忆。就此也拉开了“过去”、“过去交织着现在”、“现在”的彼此之间的多重性书写。尤其是到了第14、15、16章，针对“浦野初枝”进行了以章为单位的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的回忆，全文中也以时空穿梭的方式中间穿插了作为“苦力监工”的“加害者记忆”。

这样的看似随性的、不经意的回忆与现实的相互切换，水上勉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转换融入到小说的叙事之中，实际上令读者更进一步地跟随水上勉的心境变化而变化。通过使用将当下的行旅使与过去的“回忆”交织在一起的叙事手法，使老年的“我”和少年的“我”两条平行的时间线产生了交集，令读者产生了两个不同时间的“我”在同一空间下展开“对话”的错觉。一方面，少年与老年、过去与现在、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时期，乃至记忆与直接感受构成了时间线的两极；一方面，“满洲”这一空间作为共通的媒介，将四十八年前与四十八年后的平行时间连结起来，从而构筑起时间轴的对话“谱系”。

27)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2000年，173-1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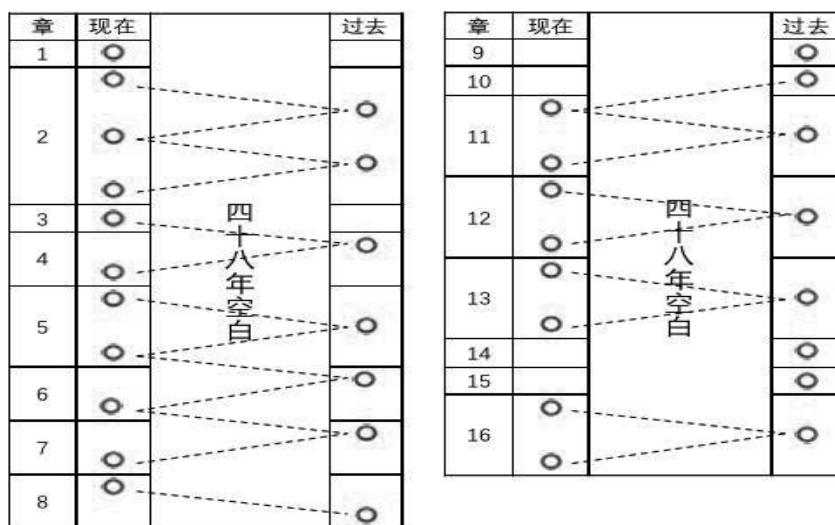


图1 小说章节时间交错示意图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样的“对话”谱系之中所潜藏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过去开拓满洲的“希望”与如今向往和平的“希望”、个体的“成长”经历与个体的“忏悔”认识、过去的“半月”的体验与如今的“满月”的感受。尤其是在自我切实地感受到一种“罪”的意识之后，主人公的人生仿佛在走向了圆满。换言之，正是通过这样的时间轴的设定，不断地在这一时间轴的两极互动，水上勉构筑起一种缅怀过去、回顾人生，带有了真正的记忆，充满了赎罪感的生涯之旅。

其次，我们也提到了“空间错位”。不可否认，时间与空间从来就不是脱离的、相对独立的存在。在经历了时间的错位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提到水上勉在这部小说中所突出的一个“空间错位”。具体而言，小说中第1章描写了老年的“我”从日本飞往北京与张和平、冷连全汇合。第2章记述了老年的“我”前往大连访问蓬坂町，到了第3-4章，则快闪回到了年轻的“我”在大连停留5夜，并在蓬坂町与妓女相伴的情景。“我”将大连称为“满洲的玄关”。第5-6章，老年的“我”继续在大连的访问，第7-16章，年老的“我”则是去往沈阳寻访旧地，回顾过去。到了第16章，年老的“我”仍然驻足沈阳，却回忆起年轻的“我”回到家乡若狭养病，也就是将最后的记忆空间留给了作为归宿之地的“故乡”——若狭。记忆的发散流变，空间的交错交织，令当下的旅途与回忆中的空间串联在一起，却几乎同步地构筑起仿佛“连续性”的一个故事。

不言而喻，这部小说采取自传式的方式来叙述主人公的青春体验，也涉及到京都、北京、大连、沈阳、若狭等一系列地点。不过，就水上所提到的中国地名而言，不管是北京，还是作为过去青春岁月记忆中的大连与沈阳，皆是与日本的对华战争密不可分的存在。尤其是大连，不得不联想起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大连之旅。1917年9月15日，游历中国大陆的德富苏峰目睹大连的胜景之后，提到：“大连现在虽然沿用了俄国人的规划，但是使其得以实现的还是我们大和民族。”<sup>28)</sup> 标榜日本为大连的近代化所做出的贡献。1938年，保田与重郎在游历了大连、旅顺之后，更是将之视为日本的“圣地”，并讲述日本的游客们“在圣地对所有的一草一木都会敬畏吧！”不仅如此，保田还游历了奉天（沈阳）的北大营、忠灵塔、同善堂，并描述自

28) 德富苏峰著、刘红译，《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50页。

身参拜奉天忠灵塔的情景。“（我）遇到二十多名白衣勇士（笔者注：指战争时期的日本士兵）一道来参拜。这是多么让人感慨的场景啊！我禁不住感慨。”<sup>29)</sup> 主人公的中国之旅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都市，也描绘出近代以来日本不断蚕食中国、不断侵略中国的图册。就是这一批中国“都市”，与近代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事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这样，水上借助空间错位的叙事策略，构筑起读者与作为历史的“都市空间”之间的对话。

概言之，人生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时间与空间的不断流变演绎中穿行往复。不过，水上勉的真实意图却不是为了阐明这样的时空交错，而是要在这样的时空交错中构筑起一个历史与现实重叠在一起、过去的记忆与当下的感受不断冲突融合，形成了以主人公为中心的独特种空间。所谓历史，仿佛就是现在；所谓现在，亦包含了过去。在这样的时空交错之中，主人公仿佛认识到了真正的自我，也确立了真正的自我。具体而言，过去的作为“半月”的不圆满、不真切，在这样语境中实现了记忆的完整与真实；过去的作为“罪”的存在的自我，得以在当下的语境中被唤醒、被认识。现实之中的我或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采取遗忘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对待过去，不过就在时空交错下，这样的“自我”不得不面对过去，由此也就产生了“赎罪”的契机。一言蔽之，时空交错成为自我形成的一大媒介，也是“自我”得以完善的一大条件。

## 2 隐喻表现

作为一部战后小说，水上勉也大量采用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倾向的“隐喻”（Metaphor）这一方式来呈现小说的内涵。在此所谓的“隐喻”，不只是日常经验下的存在性的隐喻，更带有了结构性的、创新性的内涵<sup>30)</sup>。所谓“结构性”，就是这样的隐喻并不只是单独的存在，而是带有贯穿整个文学主题的内涵；作为创新性，就是水上基本上采取前人不曾提示过的隐喻对象，并赋予了它以新的内涵。

事实上，即便是整部小说的标题，尤其是考虑到之前的标题——“沈阳的半月”，我们或许就可以感受到水上在这一标题的设定之中所采取的“后现代主义”的手法与技巧。在此，本节就拟从人名、地名、月这样的三个范畴出发来展开阐述与探讨。

首先，就是人名的隐喻。《沈阳之月》的语言文字虽然看上去朴实无华，但实际上作者却将自己擅长的“推理小说”的技巧运用在了细节之上，为后文埋下伏笔。这一点最为直接地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名称这一方面。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出作为故事辅助的人物，即张和平、冷连全这样的或为实存或为虚构的人物名称，他们尽管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但是在剖析了彼此的隐喻内涵之后，我们却可以勾勒出一个连带性的、创造性的隐喻结构。

小说之中，抵达中国之后，“我”遇见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张和平”。“张和平”在北京的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并在整个旅程中始终伴随“我”左右。“我”并没有按照日本人称呼姓氏的习惯称其为“张先生”，而是更喜欢亲切地称其为“和平先生”。或许是对“和平”抱有莫大的期待，或许是基于自身内在的愧疚与不安，“我”向张和平倾诉了自己作为“加害者”的过去，张和平却安慰我：“这是不幸的战争的噩梦，先生，这不是你的责任。”<sup>31)</sup> 由此可见，经历过战争并被迫成为“加害者”一方的水上勉，其内心对“和平”

29) 保田与重郎，《蒙疆》，《保田与重郎文库》，第10卷，新学社，2000年，第166-167页。

30) 翟东娜，《日语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42页。

31)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108页。

充满了强烈的渴望，看到中国回归“和平”，令他缓解了自己内心的罪恶之感。

小说描写的第二位具体人物，就是陪同翻译“冷连全”。与张和平不同，作者采取过多地笔墨对于“冷”这一人物进行了细致描写：冷连全三十岁左右，日语流利，举手投足之间更像是日本人，与自己的京都的从弟水上和夫比较相似。事实上，水上勉在小说一开始就打下了伏笔。文章最初，当“我”得知在中国的“日本战争遗孤”寻亲的新闻时，我内心无法把它当成事不关己的新闻。水上勉在访谈中提到：

受雇于职业科时，我曾经向“满洲”输送过“义勇军”，这些人至今都没能回国。<sup>32)</sup>

这一事件一直是水上勉心中“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在初次遇到冷连全的时候禁不住内心暗暗揣测：这样一位日语流利相貌也如同日本人的人，是否就是日本遗孤，或者是自己当年输送过的“义勇军”的后代？再次回到“冷连全”这一名称，中日之间“冷”的关系下却存在着“连”，也带有了战争孤儿走向团聚之“全”的潜在愿望，带有了一种“隐喻”的象征内涵。

其次，则是地名的隐喻。与这样的人物名称相对应，水上勉在小说之中也赋予“沈阳”这一地名以隐喻性的内涵。对于众多的日本返迁文学者而言，“沈阳”确实是一个“故乡”式的存在。返迁文学者安部公房（1924-1993）在描写沈阳之际，不无遗憾、不无赎罪式地提到：“这的确也是个称得上故乡的街市。但是，我为什么不敢断言奉天就是我故乡呢？我的父亲从个人的角度是个热爱和平的市民。但是，整个日本人的群体却是武装了的侵略移民。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没有把奉天称作故乡的资格。”<sup>33)</sup>

较之安部公房，水上勉对于沈阳却抱着一种可谓是更加复杂、更加不安的情感。四十八年前，他带着一腔热望来到“奉天”，“我相信伪满洲国是王道乐土，那里有美好幸福的生活在等待我。如果我加入新的社会，能找到合适的人结婚，组建家庭，就能实现我的梦想。”<sup>34)</sup>但是，年少的“我”却从未想到，沈阳不仅是梦碎的地方，也是噩梦开始的地方。作为殖民者的罪恶感，让主人公从此背负起沉重的“记忆”。在《沈阳之月》中，“我”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厌恶做“苦力监工”并想离开的迫切心情：

……我真是受够这份工作了。一天也不想多做了。啊啊，我要回日本。入冬以后，我的想法同初秋相比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对工作失去了兴趣，多少次在北市场的风吹日晒中，我都想闭上双眼大喊：这样的工作太讨厌了，太讨厌了！<sup>35)</sup>

与谢野晶子（1878-1942）曾在《金州以北记》中写道：“奉天自唐代以来就一直叫做沈州，到了清太祖时期叫做奉天。辽河支流浑河流经此地并向西北方向延伸，东边是肥沃的土壤，西边沿着铁路线由日本人建成了新的街区，从奉天站成放射状形成了两条大街，欧风建筑随处可见，是一个整齐的文化都市。”<sup>36)</sup>四十八年之后故地重游，“奉天”的更名却引发了“我”深刻的思考。

32) 水上勉、木村光一，《瀋陽1938——生きることの現場》，《世界》第613期，1995年，第121-122页。

33) 安部公房，《安部公房全集》，第4卷，新潮社，1998年，第484页。

34)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14-15页。

35)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105页。

36) 与謝野晶子，《鉄幹晶子全集26》，勉誠出版，2008年，第142页。

奉天当时不叫沈阳。也有称为沉（沈）阳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日本人要称之为奉天呢？<sup>37)</sup>

在所有名字之中，水上勉认为“沉（沈）阳”最为合适不过。正如水上所描述的，“太阳即使沉下去了也依旧会再升起来”<sup>38)</sup>。在水上勉的心中，沉下的太阳代表已经成为过去的“战争”，而冉冉升起的旭日则象征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希望”。

第三，就是“月”的隐喻。本论拟再次提示一下这部小说标题的变化，尤其是“月”这一范畴所具备的潜在寓意。小说之中出现了三次对于月的描写，前两次描述了主人公在田间和高楼林立之间看到沈阳的半月，但是到了小说的结尾之处，主人公终于见到了“满月”：

五十年过去了，好多记忆几乎都已经模糊了，处在一种茫茫然的状态，这应该是正常的吧。但是人留在记忆深处的那些好像古老的日历般的一两个光景，可能都难以忘怀。再次访问大连、沈阳的时候，那些已经忘记的事情，有几件慢慢从记忆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我总是会想起，好像要追赶从大连开往沈阳的夜行列车一般的那轮浮现在窗外的月亮，其挂在台风掠过旷野的枯树枝上。四十八年前，我乘坐“希望号”去本溪湖的那夜，月亮若隐若现地浮现在白雪皑皑的冰冻般的雪原的夜空中，那隐藏在夜空里没有见到的月亮，四十八年后却清晰可见。<sup>39)</sup>

自“半月”到“满月”，主人公经历了四十八年，记忆尽管陷入到模糊茫然的状态，但是一轮满月却平息了无数记忆的暗涌，尤其是年少时破碎的“希望”、作为加害者的“痛苦”体验，而今在得以真切地感受到自身所面对的真实，也仿佛诉说着过去的一切，余生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这一轮满月——沈阳之月。

就水上勉的文学创作而言，禅宗思想可谓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桥本峰雄曾指出：“水上先生的成长和人生，以及他的文学全部是佛教。”<sup>40)</sup>由此可见，水上勉所描述的“月”事实上与禅宗思想也是密不可分的。《大般涅槃经卷九》如是阐述：“如是众生所见不同，或见半月，或见满月，或见月蚀。而此月性实无增减侵蚀之者，常是满月。”<sup>41)</sup>在这里，月象征着人心中的“佛性”，月亮其实就挂在天上，人们之所以无法看到只是因为心存挂碍。换言之，心若净，则满月自现。小说的结尾，“我”终于见到了“满月”，月亮从“缺”到“圆”，这一过程既象征着水上勉自“刻意掩盖”到“反思忏悔”的行动变化，也是他自“空白”到“重拾记忆”的心境所经历的由“缺”到“圆”的过程。就此而言，禅宗思想、沈阳之月、文学创作，三者合一构筑起这部小说的“深层内涵”。

## 结论

作为小说家，水上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涉及到小说、随笔、散文、游记等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

37)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18页。

38)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66页。

39) 水上勉，《瀋陽の月》，新潮社，1986年，第176页。

40) 祖田浩一，《寺へ入った道》，《新編水上勉全集》，第6卷，中央公論社，1995年，附录。

41) 《大般涅槃经上册卷一——卷十三》，和裕出版社，2014年，第370-371页。

不过，作为水上勉的代表之作，《沈阳之月》可谓是浓缩了水上经历的“私小说”“侦探小说”“纯文学”等不同体裁、不同主体的小说之大成，不仅构筑起记忆、女性、赎罪等不少新奇的主题，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时空穿越、隐喻表现的叙事技巧，并接触到东方文化的深层内涵，故而成就了水上勉作为现代日本代表性的小说家之盛名。

不仅如此，正如本文所阐述的，这部小说的“记忆”主题涉及到“满洲”时代的空白。《沈阳之月》这部小说既是个人体验的文学表述，同时也作为战后日本文学的代表作而填补了日本这一民族或者国家的一段历史“空白”。水上勉通过历史的回忆、文学的创作，成功地将作为个人的历史与作为日本人的历史串联在一起，从而将民族与国家这样的范畴带入到个人的历史、个人的记忆之中。这也是日本文学者书写历史的一个有效而成功的方法。

回顾《沈阳之月》这部作品，主人公最后意识到了“满月”，从而将自己的四十八年岁月的流逝浓聚在少年时期的“半月”到如今的“满月”的“新奇的感受”中，带有了东方的“禅”的境界，令人无限回味，亦无限感伤。历史不过如此，人生也不过如此，唯有“满月”才能抚平人生的创伤，慰藉我们的心灵。